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八四期 ——
(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602f)

【回首文革】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来龙去脉	罗玲珊
【人物春秋】陈云与“文化大革命”	陈东林
【历史一页】东湖风云录(之十)	徐海亮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回首文革】

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来龙去脉

• 罗玲珊 •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有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就是从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到基层单位，纷纷调集“无产阶级的笔杆子”和“秀才”，成立自己的写作班子，以各种各样大批判写作组的名义，撰写形形色色的批判文章，或发表在中央和地方的报刊上，或刊登于本系统的内部刊物及墙报上。这些写作班子中较有影响的如：“丁学雷”、“罗思鼎”（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笔名）、“梁效”、“柏青”（清华、北大写作班子的笔名）、“初澜”、“江天”（文化部写作班子的笔名），还有“池恒”（《红旗》杂志写作班子）、“唐晓文”（中央党校写作班子）等等。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也在空军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在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压制的同时，这些参加大批判的“笔杆子”和“秀才”们却备受重视、十分吃香，形成强烈的反差。

◇ 写作班子成立的背景

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成立于1964年，和中央提出的反对国际国内修正主义思潮的背景和任务密切相关。从1960年中苏关系紧张开始，中央为了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把一批中央级的“秀才”调到北京钓鱼台，撰写反修文章，到1963年为止，总共写出九篇文章——《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这些中央级的“秀才”，包括中央

书记处书记康生，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中联部副部长王力，中宣部副部长姚溱，《红旗》杂志副主编范若愚等，另有陈伯达，乔冠华等人参与部分工作，这可以说是解放后中共党内第一个最高级别的写作班子。

1961年，剧作家孟超创作的鬼戏《李慧娘》上演，杂文家廖沫沙写了一篇《有鬼无害论》，为鬼戏辩护，毛泽东看后提出了批评。1962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指责小说《刘志丹》“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1963年初毛泽东观看京剧《李慧娘》，作出了要对“鬼戏”进行批判的决定。同年2月，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张春桥，提出要“破”，要批判《海瑞罢官》、《李慧娘》等鼓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的戏剧；同时要“立”，建议改编沪剧《红灯记》为京剧。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改进和加强剧目工作的报告》和《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点名批判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这一年的5月，毛泽东提出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如不警惕，“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1963年7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至此，国际国内两条战线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同时展开了。

上海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封、资、修”的任务中，充当了“先锋”的角色。1963年新年，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出席在上海延安西路200号文艺会堂举行的文艺界新年团拜会，他在会上提出“大写十三年（1949～1962）”的口号，他说：“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江青对柯庆施的举措赞赏有加，她对张春桥说：“上海比北京好得多，有柯老挂帅，可以成为‘基地’。”随后，柯庆施指示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有江南“四才子”之称的俞铭璜，写了一篇《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批判孟超的鬼戏《李慧娘》和廖沫沙的辩护文章《有鬼无害论》，用“梁璧辉”的笔名，发表在5月6日的文汇报上，文章犀利，引人注目，打响了揭批“三家村”的第一枪。

◇ 写作班子的成立经过

1963年12月，毛泽东在柯庆施送去的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报告上批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毛泽东又在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1964年初，柯庆施在上海人民大舞台作了一个报告，动员在思想理论战线全面开展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与会的是由市委宣传部选定的五百多名理论队伍及文教系统的各级领导。为了具体实施批修战斗，柯庆施决定在上海实行“两手抓”，一手抓成立《未定文稿》编辑部，另一手就是成立上海市委写作班子。

《未定文稿》是直属中共中央华东局的重要内部刊物，向华东各省市组稿。《未定文稿》先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任主编，后由张春桥任主编，周原冰任副主编，编辑部主任由华东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庞季云担任，姚文元、沈竹、钦本立（后任《世界经济导报》主编）等任副主任，专门物色华东六省一市的笔杆子，撰写批判意识形态领域国际国内修正主义思潮的大块文章，先在《未定文稿》（口头简称《内刊》）上刊登，等待时机成熟时再在公开报刊上发表。

至于成立上海市委写作班子这件事，由上海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直

接负责。1964年4月，石西民在华山路丁香花园找叶以群和徐景贤谈话，决定成立市委写作班子文学组，由叶以群任组长，徐景贤任副组长，从各个高等院校中文系和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等调集写作力量，人员的条件要求必须政治可靠，除了具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政治身份外，还必须是笔头硬扎，有过写作成果，参加过批修战斗实践的。叶以群当时任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上海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他首先提出把文学研究所的一批青年理论工作者调来，他们都是各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其中有戴厚英（华东师范大学毕业）、高玉蓉、吴圣昔、吴立昌（均为复旦大学毕业）、高彰彩（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陈冀德（上海师院中文系毕业）等人。同时，又从华东师范大学调来中文系教师王绍玺，从上海师范学院调来中文系教师徐缉熙。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一些老的研究人员，如王元化、皮作玖、魏绍文等，都被留在所里，未能到批修第一线。

文学组人员陆续到位之后，随着文艺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中央文化部向所属的电影局、电影厂派驻工作队、工作组，开始揭露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条汉子”的问题。中宣部决定在文艺界首先开展对“毒草”电影的批判。1964年8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于是，要批判的第一批“毒草”影片中又加上了《林家铺子》、《舞台姐妹》等。市委写作班子文学组面临着撰写大量重点批判文章的任务，人手不足，决定再从上海电影系统调集“笔杆子”，他们是《大众电影》编辑部主任杨振龙，海燕、天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蔡建平、赵志强、范维珩等。“战斗”最紧张的时候，还动员一些友邻的“秀才”协同配合，如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茅盾研究者叶子铭，当时被《内刊》调来撰写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文艺的文章，适值国内大批判打响，就动员他一起撰写批判文章；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汤大民，当时是上海文学研究所所长郭绍虞的研究生，也被调来撰写批判“毒草”片的文章；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胡锡涛，工作岗位是《内刊》文学组的干事，也由市委写作班子文学组安排撰写批判《早春二月》的重点文章。借调来的作者还有戏剧家协会的王一纲等。市委写作班子文学组的全盛时期，总共有二十来人。

历史组成立的时间和文学组大体相仿，成员有朱永嘉、王知常等。早在复旦时期，他们就组合撰写关于讨论“乾嘉学派”的文章，引起石西民的注意，把他们调到丁香花园成立历史组，撰写有关我国疆域的反修文章。以后，戚本禹在北京发表《评李秀成自述》一文，认定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为“叛徒”，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以后，上海写作班子历史组的几位笔杆子支持戚本禹的观点，写了文章，参与论战，最后毛泽东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历史组的文章也得到了肯定。

文学组和历史组原来是各管各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生活，领导也比较松散，如叶以群当了文学组组长以后，强调作家协会那边工作忙，自己要看《上海文学》的稿子，又要写评论文章，没有空到丁香花园来，就让文学研究所的学术秘书王道乾有时来看一下，只是蜻蜓点水。所以，就由当时组织比较严密的华东局《内刊》党支部顺带管市委写作班子的党、团组织生活。有一次汤大民与上海作协文研所来的戴厚英开玩笑，称她为“才女”，戴厚英还之以“才子”的称号。这种调侃式的玩笑话传到《内刊》支部书记林学渊的耳朵里，他一本正经向《内刊》副主编周原冰作了汇报。一天，周原冰来到丁香花园东楼，把写作班子的人召集起来，郑重其事的告诫大家不要搞低级趣味，要做“战士”，不要做“院士”。大家只好听训，不敢出声。因为这个原因，接替石西民主管市委写作班子的张春桥就和宣传部长杨永直商量，把两个组（文学组、历史组）的党员编成一个支部，以后又增加了哲学组和自然辩证法组。哲学组的成员有从华东政法学院哲学系调来的郭仁杰，从市委党校调来的程绮华、谢宗范等。自然辩证法组的成员有从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调来的沈竹、科委调来的李宝恒、社科院调来的纪树立等，都是党员。由徐景贤担任写作班子的支部书记，郭仁杰担任副书记。写作班子党支部进一步扩大，组织关系隶属市委宣传部总支部。写作班子的“战斗任务”，由市委书记

直接布置，选题文稿也由书记审查；写作班子的党团员组织生活，由宣传部总支部管理。这样，市委写作班子的领导关系、组织关系等等，总算正式确定了。当1965年初姚文元来到市委写作班子以后，写作班子又全力以赴，配合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

◇ 写作班子的写作程序

当时，市委对于理论队伍、写作队伍有一条方针，就是“以战斗任务带动战斗队伍”。“战斗任务”是由毛泽东、党中央和市委定的，例如发动对几部“毒草”电影的批判，就是由中宣部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下达通知的。中央没有提及的影片，不得擅自批判；中央没有批准的作者的姓名，也不得在批判文章中提到。又如1966年6月，在北大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公开发表以后，上海市委为了争取主动，发动对上海市党内党外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批判，包括批判贺绿汀（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周信芳（上海京剧院院长）、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均为历史学家）、王西彦（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专业作家）、瞿白音（电影局副局长、《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一文的作者）、李俊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总编辑）等，都是由当时的市委书记处会议讨论后作出决定，把他们定为“牛鬼蛇神”，召开全市大会并在报刊上点名批判的。

“战斗任务”确定以后，市委写作班子就进入“战斗”状态，程序如下：

第一步是编资料。“毒草”影片批判前，先通过上海电影局向北京文化部把这几部影片的剧本要来，内部排印成册。然后再印原著，摘编有关这些作品和影片的评论文章，如印了夏衍改编的《林家铺子》的电影剧本，还要印出茅盾的原著，加以对照，看看影片的编导对原著作了哪些增删，同时还要把过去报刊上关于影片《林家铺子》的评论文章中的论点，加以分类摘编，供批判用。

批判30年代“国防文学”的口号时，首先要找到当时赞成“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和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文章，汇编成册，还把刘少奇为这场争论所作的总结文章也编了进去。

为批判周扬的需要，写作班子把周扬过去各种历史时期所写的文章，包括在延安所写的文章，以及刊登在延安《解放日报》的几篇作品，全部找到编印成册，以此作为批判用的“弹药”。文学组曾在汇编资料的基础上写成《周扬在延安的反党铁证》一文，大量引述原文加以批判。

在为姚文元撰写《评“三家村”》一文做准备时，写作班子历史组、文学组、哲学组全面动员，选编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吴晗、邓拓、廖沫沙写的《“三家村”忆记》及《燕山夜话》，分类摘录这些文章中有“问题”的观点，编印成册。

以上这些资料，全部交给中共上海市委印刷厂及文汇、解放两个报社，印成大字本，标明“内部资料”、“供批判用”等字样，上报给市委领导，同时在写作班子各组内部使用，并留下一部分由两个报社提供给市委写作班子以外的社会各界特约作者撰写批判文章。

第二步是拟出批判文章选题。选题有的是由市委写作班子各组自拟，有的是和文汇、解放报社合拟。每一“战役”都有一个选题计划，除了重点文章以外，还有其他的配合文章。如姚文元的《评“三家村”》一文发表以后，历史组就和文汇报理论部共同拟出选题《“三家村”黑店是怎样开张的？》、《反共知识分子的狂妄叫嚣》、《“三家村”黑店如何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党？》等等。其中又分重点文章和配合文章，重点文章往往由市委写作班子撰写，配合文章除写作班

子承担一部分外，再由报社约社会各界的人士写作。这些社会作者也都是和报社经常有联系的“左派”人士，分布在各高等院校、文艺协会、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各所及市委党校等单位，大都是年轻作者。选题拟定以后，就要给作者提供条件，像批判“毒草”电影时，除了提前给作者专场放映“毒草”影片以外，徐景贤还专程去北京，到中国电影资料馆借阅资料，调看夏衍、田汉等人30年代创作的影片《狂流》、《三个摩登女性》等，以便让作者在批判“三十年代文艺黑线”时深挖这些“祖师爷”们的老根。

第三步是召开座谈会。批判文章选题由市委领导批准以后，由报社出面，邀请市委写作班子人员和社会作者参加，讨论选题分工。如批判影片《早春二月》，解放、文汇报和《大众电影》需各发一篇打头阵的重要文章，分别由徐景贤、胡锡涛和电影局调来的几个人撰写，配合选题就由与会各界作者分担。重点文章经报社排出小样，先是由石西民审查，石西民调走后就由继任的领导张春桥、杨西光审定。他们写下审查意见后，由写作班子执笔人员反复修改，再由报社派人来取，有的稿件不断改排修改稿，直至排出最后清样，送市委领导终审决定何日刊登，这样才打响了某次“战役”的第一枪。由于频繁地发稿、排印、改稿，两个报社的交通员有时一天要到写作班子来回好几次。他们为了赶速度，开着轻便两用车（类似现在的助动车）送稿样。当时两用车在社会上还是稀罕物，报社交通员在等待取稿时，写作班子的几个青年作者轮流骑上车，在院子里学，一段时间下来，几个人都学会了驾驶，可见当时报社和写作班子来往之密切。

◇ 写作班子的文章笔名

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名称，是石西民起的。当时参加市委写作班子的成员心中都十分自豪，认为自己是党所信任的“左派”，心甘情愿地做党的喉舌，用自己的笔积极投入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美其名曰“遵命文学”，实际上全是奉命写作。这一点，从写作班子所写文章的笔名上也可以看出来。

写作班子成立初始，正值全国开展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高潮，写作班子除了姚文元写大块文章由领导上决定用真名以外，其他的人基本上都不用真实姓名，而是用集体笔名，特别是重点文章，更是领导意志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文学组的笔名是“丁学雷”，寓“丁香花园学习雷锋”之意；历史组的笔名是“罗思鼎”，意思是“学习雷锋，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思想文化界的人一看署名“丁学雷”、“罗思鼎”的文章，就知道这是代表中共上海市委的声音。大批判文章的语境也是居高临下的、以势压人的、主观武断的、不容置疑的，而不是平等的、探讨的、说理的、商榷的。这种学风和文风，正是那个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影响极坏。

除了“丁学雷”、“罗思鼎”以外，写作班子各个组还用过很多笔名。从“文革”前的市委写作班子到“文革”期间的市革委会写作组，用过的笔名不下几十个。比较有影响的如历史组的笔名“康立”（武康路历史组的谐音），这是从丁香花园搬到武康路，后来又搬到康平路，一直沿用的。文学组有的文章要另起笔名，徐景贤建议说：“我们刚刚开始做毛泽东的学生，就起一个叫‘方泽生’吧！”后来又写了另一篇较有分量的文章，起了笔名“方岩梁”（毛泽东诗“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谐音）。因为写作班子一开始住在丁香花园，文章的笔名姓丁的特别多：两人合写的署名“丁加”，三人合写的叫“丁川”，多人合写的则用过“丁影”、“丁闻”、“丁葵”等名字。这些署笔名的文章，在写作的时候，往往由一个人先执笔起草初稿，另一个人修改，集体讨论后又有人作进一步加工，直至最后定稿。所以，现在要回顾哪篇文章是谁独自完成的恐怕很难，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区别了。像后来市革委会写作组《鲁迅传》编写组的11个青年人，用“石一歌”的笔名集体写文章，正是继承了这样的传统。

即使完全是个人写的文章，也往往使用各种各样的笔名，使对手摸不清底细。如在武康路

二号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过程中，写了一篇批判历史学家李平心的文章，当时他正和写作班子历史组同在二楼办公，共同编资料。历史组的基本班底是四个人：朱永嘉、王知常、吴瑞武、朱维铮，都是从复旦调来的。姚文元写完后，开玩笑说：“你们历史组四个人，加上我是五个人，共同来批李平心，这篇文章的笔名就叫‘伍丁’吧！”姚文元又曾给《文汇报》写过几篇批判文章，他说：“毛主席庐山仙人洞诗中有‘暮色苍茫看劲松’的句子，‘劲松’这两个字含义很好，就用劲松做笔名吧！”文章发到报社去，除了写作班子以外，只有文汇报总编辑陈虞孙知道，把“劲松”文章发在显著地位。姚文元的妻子金英当时在卢湾区工作，姚文元写文章时也用过“金文”、“金兆文”做笔名。

◇ 写作班子卷入了“一月夺权”的政治旋涡

写文章除了“名”，还有“利”，为了和“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决裂”，写作班子提出写战斗文章不要稿费。写作班子成员认为：既然宣称自己在丁香花园学雷锋，而且要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既然认为调到写作班子是非常光荣的事，是党在思想战线前沿的战士，现在党号召的战斗打响了，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向哪里，那么，写这样一类文章怎么还要稿费呢？于是，写作班子就通知报社停发稿费，而且把早期写的几篇文章收到的稿费，上交给市委作党费。从全国来讲，解放以后取消过两次稿费：一次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报刊都取消了对所有作者的稿费，但到1962年，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以后，随着各项经济政策的调整，稿费又恢复了。第二次全国废除稿费制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但市委写作班子在1964年就提出不要稿费了，表示自己最“革命”。

市委领导陈丕显、曹荻秋看到写作班子成员夜以继日，很辛苦，就要市委秘书长李家齐来关心，要“慰问慰问同志们”。怎么慰问呢？烧几个好菜。当时大家不管在丁香花园或是在武康路二号，大部分人住集体宿舍，一日三餐都是从康平路市委伙房装上黄鱼车用棉被盖住拖来，大家自掏腰包买饭票吃饭。李家齐觉得过意不去，就用上交的稿费，要市委伙房的大师傅做了三桌菜，什么松鼠鳜鱼、脆皮鸭子等，送到武康路二号楼下大厅里，放在几张乒乓球案上。徐景贤把各组人员都召集拢来，把姚文元也请来，共同聚餐，皆大欢喜。

当时，被调到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成员，都以知识分子中的“左派”自居，以能够成为这支战斗队伍的一员感到无尚的光荣。所以，在追随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投入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以后，继续紧跟，1966年12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动下，全体写作班子成员宣布造中共上海市委的反，投身于上海“一月夺权”，更深地卷入了“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的旋涡。

□ 《百年潮》2005年12期

~~~~~

#### 【人物春秋】

#### 陈云与“文化大革命”

• 陈东林 •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从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起一直处于“养病”状态的陈云，仍遭到了“左”倾错误的排挤和打击，其间还一度被下放到江西两年多。他虽然一直被保留着中央委员的名义，但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始终没有能回到中央政治局。尽管如此，陈云仍然利用各种机会，努力抵制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由于“文革”这个特殊时期的史料保存和披露较少，再加上陈云在世时不同意对他个人的各种宣传，他的秘书们

回忆说：“有关宣传他的文章、书籍，只要报到他那里审阅，一律被他‘枪毙’。”因此，陈云的这些事迹还不被人们完全知晓。

◇ 工厂就是要搞生产，如果工厂只搞革命不搞生产，我们吃什么

1966年8月，随着刘少奇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批判，1962年协助刘少奇进行经济调整的陈云，也遭到康生攻击，说陈云“也是长期与主席对立的。他以经济专家自居，自以为他的经济学在主席之上。看看他的1962年的报告，就懂得他的经济学是什么货色。他只讲经济，不讲政治。他讲的经济政策，据我看，只是资本主义的商人经济而已”。

会后，陈云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一起，实际被免去了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不久，大字报上便出现了“打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陈云”的口号。以后，造反派又成立了“彻底批判陈云联络站”，要求把陈云拉出去批斗。只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下，陈云才免于难。

1968年10月，林彪、江青集团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掀起了围攻老同志的风潮。谢富治“揭发批判”陈云说：“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发言，他说没调查没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做了个黑报告反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攻击陈云“多年不做工作，刘少奇突然抬出他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一贯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东西都要清算”。

在逆境中，陈云虽然不得不多次作出“检查”，但他从不违背事实，更不打击同志，仍然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抵制极“左”错误。

陈云对污蔑天津工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袁血卒有“历史问题”的学生说，“黑帮”这个词可不能随便用啊。说袁血卒叛党、叛国，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在陈云三次去信耐心劝导下，那些原来要打倒袁的学生改变了态度，要求把袁树为革命领导干部。陈云的这一态度竟被康生攻击为“又一次包庇”。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举行。由于林彪、江青集团的攻击和污蔑，自1931年9月就进入中央领导层、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的陈云，35年来第一次被排除在中央政治局之外。只是由于毛泽东的指示，他才被保留了中央委员。

5月，陈云被下放到北京新华印刷厂“蹲点”调查，学习“文化大革命”中的“六厂二校先进经验”。从小做过学徒的陈云，看到工厂到处被砸烂规章制度的“斗、批、改”浪潮冲击，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忍不住给叶剑英写信，请他转周恩来报毛泽东，指出规章制度有些不该废除的也冲垮了。他举例说，比如在几个人共同操作的机器开动前必须按警告电铃，以便每个人都做好准备，避免事故，这个安全操作规程“绝不能废除”。

10月17日下午，陈云由中央办公厅统一安排到首都体育馆观看乒乓球表演。表演结束后，他和董必武、朱德等一批老同志被意外地通知到后台开会。周恩来向大家宣布毛泽东和中央关于战备疏散的决定说：“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一些同志在20日之前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并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各地安置工作由我打电话安排，中央办公厅负责准备专机或专列。”

陈云被安排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调查，住在距离工厂1公里的南昌郊区青云谱干部休养所。进厂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大家对他如何称呼。江西省为了保密，对下面只说他是

“北京来的客人”，还说这个“客人”“有右倾错误，但还是中央委员，对他要注意安全，还要向他宣传毛泽东思想”。但是大家一眼就认出了他是过去在报纸上常见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于是，有一个工人试着叫他“老首长”，见没有遭到厂领导的异议，这个称呼就被大家通用起来。而陈云则给自己起了个化名陈元方，这是他从两个孩子的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

虽然离开了政治风云中心北京，但陈云仍然关心着国家的生产。1971年9月，他在听汇报时指出：凡是对“抓革命、促生产”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凡是对“抓革命、促生产”不利的就是错误的！当听到当地两派群众组织都有过打人的现象时，他说：打人在历代都是犯法的！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对自己的错误有所改正。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相机而动，向毛泽东提出了解放大批老干部的建议，得到逐步采纳。一部分长期疏散在外地的老干部的处境得到明显改善。

1972年4月，中央批准陈云返回北京。4月21日，陈云到化工厂向工人和干部话别。上午，他还向工厂的负责人谈了近两个小时的意见和建议，重复了他过去的一贯看法：工厂就是要搞生产，如果工厂只搞革命不搞生产，我们吃什么？国民经济怎么发展？国家怎么发展？他还反复强调要提高效率，注意节约。

4月24日，陈云回到了北京。6天之后，他在国务院的安排下，参加了在中山公园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游园活动。7月，他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安排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每年春季和秋季到下面作些调查。7月22日，毛泽东批示：我看都可以同意。7月31日，长期不能公开参加国家政治活动的陈云，和王震、苏振华、杨勇等一起出席了国防部庆祝建军45周年的盛大招待会，陈云的名字前又冠以“副总理”的字样出现在报纸上。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陈云在中央有关会议上就自己所知进行了积极的批判揭发。然而“四人帮”一伙仍在全国各地兴风作浪。1972年6月，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周恩来在巨大压力下被迫做了检讨自己“历史错误”的报告。在周恩来困难的时刻，陈云挺身而出，针对江青集团栽赃周恩来的“伍豪启事”发言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他还写出书面发言说：“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 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

从江西回到北京，陈云参加了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协助周恩来开拓外贸工作。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遇到一场大规模经济危机，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引起了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极度不安。这样，原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壁垒开始松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日益增多。

从1973年到1974年，陈云协助周恩来进行了外贸工作的领导和研究。他敏锐地看到了世界形势这一变化，以他特有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带有真知灼见的战略性意见，为我国20世纪70年代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开拓，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首先，抓住时机，大胆地提出了“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利用外资的新课题。

1973年6月7日，陈云在家中约见了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陈希愈等人。问过在延安一起搞财经的乔培新的情况，他感慨地说：“你也这么大了，也算老年了！你还可以活20年。不过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这最后一句话是指当时的国际形势。陈云说：“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面向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东欧。”他还说：“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他幽默地说：“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

陈云的这个判断，可以视为新中国向西方国家开放的认识转折点，在当时动辄批判“对外投降卖国主义”的政治形势下，如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他还提出了要研究资本主义的10个具体问题，如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发行量、黄金储备量、美元分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赤字等，并且要求银行研究西方领导人尼克松等的讲话、文章，利用外资。1973年，中国人民银行积极开展了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的工作，一年中筹措到10亿美元。这在一年引进几百亿美元的今天只是一笔小数目，然而却迈出了中国利用外资的新步伐。

其次，积极支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及管理经验，利用国际期货市场等手段为国内服务。

1973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引进预算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方案（即“四三方案”）。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厂等项目。陈云坚决予以支持，还指出：买旧轧机要慎重从事，先要派人去看清楚哪些设备能用，哪些不能用，事先准备好新配件。并且要求学习旧中国永利化工厂、太原钢铁厂等买设备的经验。

过去，外贸部门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国内急需物资时，常常是直接购买现货，外国资本家一看到订单，就大幅度抬价，使我们吃了不少亏。在陈云指导下，外贸部门改变了这一做法，开始利用国际期货市场商品交易所。如一次接受了购买砂糖4.7万吨的任务，外贸部门先不急于购进现货，而是购进2.6万吨期货，再购买4.1万吨现货。待到交易市场上得知中国购买的消息，砂糖价格上涨，再抛出多余的期货。这样，不但顺利完成了采购任务，而且还为国家赚取了240万英镑的外汇。陈云总结这次经验说：“国际市场上的交易所是投机商活动场所，但也是一种大宗商品的成交场所。”“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他还指出：“在今后两年里，对交易所要认真进行研究。”今天，中国不仅全面参与了国际期货市场的交易，而且有了国内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这个开创，可以追溯到陈云当年的指导性工作。

再次，主张进口原料，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加工成品出口，再进口国内急需物资。

早在1961年，陈云就提出并主持制定了从中东、东非“全球购棉”，加工成纺织品出口换汇，再进口粮食的战略，为克服国内粮食严重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市场上棉布价格较高，棉花价格偏低，而国内棉花歉收，棉布供应紧张。但在极“左”思潮压制下，有人却认为进口外国原料再加工出口是依靠外国，不是自力更生。陈云再次主张，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以加工成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要长期这样搞，我们有劳动力，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同时，他还主张，在整个外贸工作中，都可以这样做。中国人多，进口化肥设备和化肥，增产粮食，再出口大米和肉类，就是大的加工出口，同加工

棉布出口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是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这个道理是容易讲通的。1973年，外贸部门进口了1600万担棉花进行棉布加工，一部分出口换汇，一部分解决了国内需要。陈云的这个思想，邓小平在1975年整顿中将其发展为以补偿贸易方式引进外国技术设备的“大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更扩大成为“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图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利用外资重要手段。

当时，有人提出利用外汇资金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针和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以及同现有规矩相矛盾的疑问，陈云坚决地指出：要把一些界限划清楚，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要把大道理讲清楚。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1973年10月，他在听取外贸部汇报时指出，进口轧钢设备，有关的附件和原材料要一起进口，如果缺了零配件，就要推迟生产，很不合算。江青等不敢直接反对毛泽东已经批准的进口设备计划，就反对进口有关附件，说这是“洋奴”。陈云愤然而起说：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1974年，江青集团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指使上海港码头贴出“要做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大字报，攻击扩大外贸是“帮助外国资本家剥削”。陈云经过冷静思考，针锋相对地说：对去年利用国外交易所买糖是否是剥削了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问题，我想了一年。恩格斯讲过，交易所是剩余价值分配的场所。我们利用交易所，只是不让资本家得到全部的超额利润，并没有剥削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

陈云当时对国际形势的预见性分析，对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战略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73年，他在听取外贸部汇报时指出：现在，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谁也不敢轻易打。这样，生产力越来越大，而市场的容量有限，矛盾也就越来越大。我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各个因素，如次数、周期变化都要好好研究，这对我们的外贸特别是进口关系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起，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世界生产力迅速增长，形成高科技的全球化浪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别成为时代主要矛盾，证实了陈云的这个判断。

1974年7月，陈云撰写了关于7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两份提纲，第一份是《对目前世界经济危机的看法》，第二份是《这次经济危机与1929年危机的比较》。在提纲中，陈云提出的国际形势判断，不仅符合当时的形势发展，而且对比以后的30年，与他的许多预见也出现了不少惊人的吻合。例如，关于世界新格局，他指出：“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新的国际关系”，“以美帝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虽然遇到经济危机，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仍然是有较大发展的”；“一度出现过的社会主义阵容”“不存在了”；“现在是三个世界。广大第三世界出现是最大的变化”，“帝国主义殖民地区和力量已缩小了”。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多极化世界格局证实了他的远见。关于未来的战争，他认为，首先是“部分战争”，如“挑拨第三世界之间发生战争。帝国主义武力占领中东产油国”。这已经被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90年代海湾战争和2003年美国占领伊拉克的战争所证实。关于经济危机，陈云判断说，“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轻微受害或不受害。第三世界国家劳动人民受害最大”，“最大的石油出口和石油出口收入多于其他进口货国家是得利者。资本主义大国的垄断资本家是最大的得利者”。1997年冲击世界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后果正是如此。它明显不同于过去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危机，出现了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的特点。这两份提纲，反映出陈云在“文革”条件下仍然保持着敏锐的国际问题洞察力和长远的预见性。

陈云在“文革”后期开拓对外经济工作新局面的宝贵思想和实践，与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当时的开放探索一起，汇集成流，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喷薄而出，迅速奠定了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基础。

◇ 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把手伸向了最高权力。华国锋、叶剑英等开始考虑除掉这个毒瘤。当时，可供选择的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用合法手段把“四人帮”搞下去；另一个是采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帮”抓起来。采取何种方式，颇费思虑。

难以决断之际，叶剑英想到了在党的历史上久经风浪、立场坚定、长于谋略的陈云，并请王震多次找陈云商量。据姚依林回忆，一次他去北长街陈云家递交关于江青问题的材料，看到陈云在家里反复研究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算来算去，觉得并没有完全的把握。通过子女传话与叶剑英交换意见后，10月1日晚上，陈云冒着被“四人帮”发现的危险，穿上大衣，把帽子压得低低的，身子蜷缩在车子后座里，前往叶剑英的西山住所面谈，他进去时，正好遇到邓颖超谈完出来。叶先给陈看了毛泽东关于“四人帮”问题的谈话记录，然后问陈怎么办。陈云坚定地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在陈云坚决态度的推动下，中央下了决心，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和国家。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里，由于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文革”，中央领导层没有得到彻底的调整，因此“左”的指导思想仍然束缚着前进的步伐，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革”的“左”倾错误仍然在继续。

在政治上，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方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仍然统治着全党，“文革”造成的许多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被错误打倒的老干部难以出来工作。

在经济上，“文革”造成的经济混乱状况没有得到调整，反而又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倾向。在规划部署上，仍然是“文革”中的老办法：一是继续提高积累率，扩大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使“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结构持续严重比例失调的矛盾更加突出；二是继续“抓革命促生产”的老模式，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抓纲治国”、“大批促大干”，大搞“全国普及大寨县”等政治运动和大会战。

针对这两方面的严重问题，还没有进入中央决策层的陈云，以他在党内的崇高威望影响和推动着中央，为纠正“文化大革命”遗留错误而进行不懈的努力。

1977年3月，陈云在向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海代表团提交的书面发言中指出：天安门事件的“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会议工作班子要求陈云按照华国锋讲话的口径修改这篇发言，被陈云拒绝，结果会议简报竟不予刊登。但这两篇发言都在会场内外传开，产生重要影响。

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后，陈云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提出要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和评价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其中包括：重新审查所谓“六十一人集团”和陶铸、彭德怀等人的结论，肯定天安门事件，结束专案组的不正常状态，审查“文革”中有严重问题的康生等。他强烈表示：“这些问题不解决，在党内党外都很不得人心！”搞清“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情并不是纠缠历史旧账，“不是要搞运动，只是要中央开个口”。陈云的发言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使会议突破了原定的框框，开成了一次解放思想、集中批判“左”倾错误的会议，成为党和国家拨乱反正的一个伟大起点。

为了纠正经济方面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发言指出：不能到

处紧张，要多进口一些粮食，把农民安稳下来；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这是第一次把比例失调的问题摆到全党面前。全会对陈云的意见给予了高度重视，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不久，陈云、李先念又联名写信给中央，建议用两三年时间调整经济，把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大体调整过来。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后表示赞同。

经过纠正上述政治、经济两个方面的“文化大革命”遗留的错误，党和国家摆脱了历史包袱，轻装上阵，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这是和陈云的重要贡献分不开的。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会后，他面临着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及这一时期的人和事，如何处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大量问题。当时曾经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另一种认为完全是林彪、江青野心家集团的犯罪内乱，只能通过审判处理。陈云提出了有独到见解的意见，他认为：

首先，要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后果区别开来。陈云说：“关于对‘文化大革命’的估计，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为了防止中国变修，出现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事件，最初也不是要搞那么大。这个问题需要作一个总结，总结时要很慎重，要把林彪、‘四人帮’等人的破坏作用估计进去。”他还说：“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文化大革命’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一点责任，但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不能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在这个问题上，要平心静气，要掌握分寸，慎重考虑，不能感情用事。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在指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陈云又提出了增加建国前28年历史的建议，对邓小平要求充分肯定毛泽东历史功绩的原则，给予了有力支持。

其次，要从制度方面认识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陈云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关系到民主集中制。从七大到全国胜利前，我们党都很民主。建国初期，民主集中制也贯彻得很好。从1958年起，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民主集中制传统被一点一点地破坏。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说什么‘顶峰’、‘一句顶一万句’，民主集中制搞得很不好。这其中有许多帮倒忙的人。”后来，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再次，对“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同志，要批评和帮助，树立正确的党内风气。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有4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其后两年犯有严重错误的政治局委员提出辞职。陈云指出，对这些同志应该全面地考查，既应看到这个同志犯了什么错误，也应该看到他在党内做过什么好事，还必须看到当时党内的整个情况。不赞成“扭住不放”，检讨没有完没有了。同时，他也严肃地指出，这些同志不要自己觉得委屈了，应该想一想我是否可以不犯这样的错误。

最后，对“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罪行的人，也要区别对待处理。陈云曾对浙江省委书记铁瑛说：“处理‘四人帮’与处理林彪反革命集团要有区别，‘四人帮’这些人祸国殃民，‘文化大革命’十年干尽坏事。而在战争年代，他们也没有任何战功。林彪反革命集团则有些不同，他们主要是部队的。像黄、吴、李、邱他们，包括林彪，过去这些人都打过许多仗，也立过各种战功。他们现在犯了罪，应该处理，但与‘四人帮’应该有所区别。”即使对江青集团的首犯，陈云也不主张完全按刑事犯罪处理。审判“四人帮”前，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同志主张判江青死刑。陈云说：“不能杀，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说：“党内斗争也可以杀。”陈云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事实证明，不杀的处理在国内外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根据陈云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审判庭对林彪、江青集团的审判名单，由原来的100多人集中到10个主犯。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相互交织、严重混淆的错误政治运动，延续时间长，规模大，解决起来很困难。陈云在复杂形势下善于冷静思考，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正像他所说的“我是一方面小心谨慎，一方面又很硬”，为党和国家渡过急流险滩，走向胜利的彼岸，作出了重要的引导和支持。

□ 《党史博览》2005. 11

~~~~~

【历史一页】

东湖风云录（之十）

• 徐海亮 •

（二）陶铸在中央失势

长期以来，各种文革研究和回忆在谈到陶铸被突然抛出、打倒，都疏于交代内情和分析，似乎，陶铸居然被陈伯达的一席话，江青的一个口号，或者与武汉揪王造反团的不愉快谈话与冲突，就垮台了。武汉的一些造反群众也天真地以为陶铸是被群众打倒的，众多的所谓文革纪实作品，都把陶铸在中央的突然垮台，简单归咎于陈伯达、江青，以及武汉赴穗专揪王任重造反团，都是浅薄和回避史实的。那么，为什么毛泽东选中的文革大将——林彪也深信是自己人的陶铸，会变成是邓小平推荐的“刘邓的人”呢？毛泽东讲过陶、王是“龙虎二将”，王有“总理之才”；在1966年组建文革司令部时，毛泽东把来自三方的，关注和赞同他文革理念也熟悉意识形态问题的力量，组入中央文革，即北京的意识形态——“红旗”杂志理论帮、上海的意识形态帮、中南行政一意识形态帮。最先退出或被赶出这个左派领导核心的，是长于行政，向往毛的文化思想解放，又和原来的党政体系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南局领导人物。在有新的研究材料问世之前，我们暂以王力的回忆来概括一下陶铸个人在中央的失落。王力在其“反思录”中，除了未谈到他自己在陶的问题上有什么主观的过错，应该说还是较真实地交代了高层运作的内情。

在安亭事件里，开始总理、陶铸和其他中央领导“意见是一致的”，“都没有支持中断交通”；“张春桥也没有不同意见”。后来张春桥对“工总司”让步，陈丕显立即给陶铸、陈伯达报告并表示不满；江青认为“上海市委就是要整”，“马上报告主席，连夜报告，不能让陶铸先报告”。次日毛泽东开常委扩大会，表示支持张的表态，会上没有人不检讨的，包括陶铸。在这里，王力专门联系到陶铸就是先去汇报也不行，“因为同陶铸的分歧是9月就已开始了，9月毛主席就对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陶铸同志不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指刘邓，而‘批判不彻底’，主要是指总理同陶铸。在毛主席看来总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陶铸。‘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主要是对陶铸”。

工厂农村运动的指导。王力说陶铸与毛泽东不一致的地方，“就是陶铸搞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两篇社论和关于工厂、农村文化大规模的两个通知。其实这些文件毛主席都看了，都划了圈，实际上不满意”。“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确实是陶铸主持的，不是总理主持的。在会上陶铸说：‘就是要把他们压下去，写这社论把他们压下去’……中央说对跨行业的工人组织不承认、不支持、不参加，但是没有说压下去。……在会上总理的态度已经转了，陶铸还没有转”。（王力也说，后来陶铸的检讨讲没有“把革命压下去”的意思，可能系信口而言）

工交座谈会和工矿十条制订，进一步使陶铸处于被动状态。因为毛泽东早就提出工矿企业

要搞文革，光是学生不行，工人不起来还是不行。在工交会上座谈原拟12条，谷牧等说太左了，并发了简报。但“直到现在，谷牧的回忆录中还不知道毛主席的态度，好象毛主席还支持他们似的。他们到现在还认为陶铸不是毛主席打倒的，曾志也这样说”。“第二次工人又起来，又让他们（名义上是总理，主要是陶铸）压下去了。这是指1966年9月7日陶铸搞了个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这个社论看起来没有什么，但同毛主席的精神不那么符合”。“9月14日，陶铸又抓了两个指示：一个是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毛主席的看法：革命哪里去了？……他反对‘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领导班子）。毛主席的看法，要群众自己选出来的班子统一抓革命和生产。毛主席总认为搞了17年的现在这个机构不行，要改一改，冲一冲……，陶铸还是执行的过去的一套”。

“工交座谈会简报，毛主席相当不高兴。这是陶铸主持的”“毛主席不同意15条，而且不高兴，特别对陶铸不满意……陶铸知道毛主席对安亭事件的态度以后还这样说，这不是顶着干了吗？……毛主席对陶铸说：‘总要支持工人建立联合组织，这不是大家都同意了吗’？”“（12月中央会议）中央的人都拥护毛主席的观点，这也不能说是违心的。总是要跟上毛主席的思想，不能跟陶铸的思想，跟谷牧汇报的下面人的思想。6日的发言就不一样了，这一天要正式通过十条。这天发言不是对谷牧，是对陶铸”。

关于江青与陶铸的冲突。王力说“十一中全会常委名单中有陶铸，这名单最早是毛主席提的。决定名单的是总理、林彪、江青。毛主席只征求这三个人的意见……江青要把陈伯达调到邓小平前面。江青又说陈伯达压不住邓小平，陶铸厉害，把陶铸提到陈伯达前面，这样陶铸就成了第四位”。但在会议简报里，陶铸未采用谢富治批评邓的内容，立即遭到江青责骂。后来因为社会科学学部吴传启问题，两人发生激烈争吵；叶群得知，告诉林彪，“林彪原来对陶铸很好的，后来也不敢太接近陶铸了”。不过阎长贵回忆分析认为：“王力的说法，即把陶铸提到第四位是根据江青的意见定的，不可信，不可传；把陶铸提到第四位，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可能还征求了林彪的意见）根据需求和实际情况商定的，这恐怕是事实，也符合情理。对王力的这种说法，许多人（包括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认为，是瞎说，开玩笑，不足信，江青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影响力和决定力。况且江青对陶铸也不会那样有好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江青曾鼓动陶铸揭发和批判邓小平、刘少奇，遭拒绝，她正耿耿于怀，怎么会为提高陶铸的地位而用力呢”？

关于中央书记处。王力认为：“陶铸还要搞书记处。他开了几次书记处的会，他没有理解，毛主席要他当文革小组顾问，意思就是不要象过去一样。还叫他管宣传口，事够多的了。并不是叫他去搞书记处。可陶铸要搞书记处，要搞班子。他把王任重调来，把张平化调来，宣传部组织部都要安上自己的人。如果真要搞书记处，恐怕还要调人。毛主席对此是不满的……毛主席说过，邓小平是这样，彭真是这样，陶铸还是这样，自己要搞一套。毛主席说他们这三个人性子都太急”。

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陶铸。王力回忆：“毛主席定了（12月）6日会上要批评陶铸，要陶铸检讨。要不然这个会就成了对谷牧的了，这不能反映问题的实质。谷牧说他万万没想到，有的书也说突然袭击陶铸。我没觉得突然，因为是毛主席定了的。这会上常委们不好出面批评陶铸，所以在酝酿时要我们这些人发言，特别是我……陶铸坚持要加上‘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党组织是好的，是可以信赖的’。这说法本来也没有什么，可是他是在毛主席说要‘依靠坚定的革命左派’的前提下这样讲的。陶铸说共产党员、党组织是革命左派的核心，这同毛主席的思想不一致”。“毛主席的意思要陶铸表个态，陶铸作了检讨……陶铸在会上承担了责任，他不要余秋里、谷牧负责任。这是符合实际的。陶铸承认自己坚持老框框……毛主席思想发展了，主张工人农民要起来，我思想没赶上……他说他思想落后于实际，坚持主张不搞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一直到最后。他一直不赞成离开工厂去串联，不赞成学生到工厂……他检讨说他对汇报提纲中的一

些观点并不是完全同意，但其中有些观点他是赞成的。他说他的思想反映了党内现状，就是十一中全会后没有解决问题，十月工作会议也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各省各部抵触情绪很大，思想不通，在许多问题上有抵触，有怀疑”。

关键是林彪的总结，他说“实质不是谷牧的问题，而是陶铸的问题，是书记处负责人坚持一些错误观点，现在本人也作了检讨。他说工交座谈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同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坚持旧的一套”。

告陶铸状的信。“11月14日以后，毛主席收到一些告陶铸的信。毛主席说第一个正式告陶铸的是唐平铸（按：指告发陶铸同意新华社报道采用“换头术”事），毛主席说第二个告状的是关锋、戚本禹，他们列举陶铸的七大罪状，说陶铸参与制订刘邓路线，执行刘邓路线”。

王力将陶铸的失落直接与毛泽东业已不喜欢他联系起来，如果历史内情确实完全如王力所言，这些问题显然是陶铸与毛泽东在当时的原则分歧，是毛泽东绝对不会让步苟同，陶铸刚直不阿，也并不准备真正向毛泽东做妥协的。

很快，陶常委和毛主席都说了：

“咎由自取”！

真是两个湖南的犟脾气。陶铸讲的是他坚持自我主张，明白决没有好下场。毛泽东正是针对陶的表态，义正词严地断言没有任何人能阻挡运动的深入。

中央最高层的这种不可调和的原则性斗争，成为陶铸、王任重变为悲剧人物，最终落马垮台的根本原因，也成为武汉的运动居于九州文革极为显著位置的一个原因。

中国的文革派和反文革派，必定逐鹿中原于斯。

第五章 陶、王的冬天（下）

三、陶铸的寒冬来临

经过11月工交会议的斗争，对于陶铸而言，异常酷烈的严寒终于来临。

12月18日，江青、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宋琼等接见了首都一司、二司造反联络站、三司首都兵团以及部分院校革命派代表。江青在讲话里公开点了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的名：“周荣鑫、王任重、雍文涛、许明、孔原都是西城区纠察队和东城区纠察队的后台支持者。周荣鑫与彭真、薄一波有联系，雍文涛也很坏，以前总是通过王任重来拖着中央文革犯错误，做了很多坏事”。当时，北京造反群众正猛烈揭批“西城区纠察队”阻截文革的行径，王任重在北京很快被江青搞臭，陶、王带来的广州雍文涛书记也倒了。

武汉造反群众得到中央文革抛弃王的信息，更是信心十足，将批判王任重的口号和措施迅速升级。12月21日，中南局将王任重接回广州养病；武汉造反派获悉后，联合组成“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旋即与中南局机关交涉，要求批判和揪斗王。

武汉方面，得到武汉市委支持——12月初成立的武汉“革命职工联合会”力量迅速壮大，当时“联合会”以武汉重型机床厂老劳模马学礼为名义上的领袖，抵制造反派批判省委行径，

强烈反对封闭省报，针锋相对提出：湖北日报立即复刊；解散工人总部；坚决反对学生到工厂串连。“职工联合会”以一色织布厂档案员林焕运在造反派抢档案时发生冲突，心脏病发作病故为由，12月25日在汉口中山公园开追悼会，会后抬尸游行，有五千多工人参加；他们宣传林焕运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所殴致死，要造反派偿还血债，并强迫武汉市委降半旗。“保守派”的首次全市行动在广大造反派看来实在是愚蠢、拙劣，学生们立即宣传、指责这是“反革命游行”，特别是游行在毛主席寿辰前一天举行，追悼队伍还高举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这不是公开侮辱领袖吗？

27日，武汉工人、学生造反派20万人以“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镇压反革命”名义集会，与25日对立派组织的“抬尸”游行针锋相对。会后，工总、九一三、二司、新华工、新湖大、三司和南下造反大队等成立联合批斗王任重指挥部。对于武汉25日的“联合会”群众游行，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李一清在广州表态，不支持“联合会”抬尸游行，并指出“联合会”是保守组织。闻讯，“联合会”群众极为不满，数千“联合会”工人包围省委，强烈要求中南局收回李一清表态；部分“职工联合会”头头鼓噪去广州揪斗李一清，未果。

这是意味深长的转变，武汉原来意义上的“保守派”，再不是省委手下听话的顺民了，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造反派”，可以动辄造反，造原来支持和利用过他们的领导的反，造各种不顺他们心意问题的反，而且言论、行为模式与以往的造反派几乎一样；鉴于他们隔膜于激进知识分子为先导的造反派时兴的文化模式，其行为时还特别暴烈“少文”一些。可以说，武汉职工群众的保守组织，一成立就是以造反形式出现的，实质上是在逆文化革命而动。开了头就具有惯性，这种惯性延及以后。1967年“武汉事件”的群众层面问题也在于此，从而给中国现代历史和政治留下社会学研究的深刻话题。30日，陶铸在接见武汉造反派时就颇为不满地谈到此事：“一个工人死了随便下半旗，我们死了都下半旗，那还得了。下半旗是要对那些有重要贡献的，这是错误的，要充分揭露，这是反对文化革命的行为”。此外，学生的保守派已经很难干预运动走向，也影响不了工人群众，他们基本上退出舞台；而学生造反派的激进要求和言行，影响与决定着运动的走向，他们与工人造反者紧紧合作。

12月22日，陶铸接见湖南赴京造反者，陶铸听代表汇报了湖南发生系列的群众斗群众流血事件。陶铸本着一贯支持湖南红色造反者的态度，他与群众进行了友好的交谈，涉及到对中南局湖南省委，乃至湖北的看法：

“同志们集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改组湖南省委，打倒张平化，罢张平化的官。许多口号，我举了手，你们喊：‘打倒张平化，罢张平化的官，撤张平化的职’我就没有举手，但心里是举了手。我不好表示态度，因为中央没有作出决定，如果我举了手，那就是中央作出了决定。但是，同志不要以为我包庇张平化，同志的要求是正当的，合理的，有道理的。我内心是支持你们的。

“我当了六年的中南局书记，干了十五年中南局工作……中南局的书记是王任重同志。中南区的文化大革命有问题，我是有责任的。就是到了中央，中南局的工作，我在中央也是要过问的。工作没有搞好，湖南张平化调去，总的，是搞得很坏……过了几天就反击，我当众打电话警告了他，我们看了张平化‘9.24报告’，这个报告是错误的。以后又搞了个‘中央八条’，又进行大反击，这样搞是错误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了他，在北京的革命师生开了大会批判了他，要他回去作检讨，彻底改正错误，把湖南文化大革命搞好。但他回去下的决心不大，没有成绩。……我赞成你们改组湖南日报编辑部。湖北日报也改组了么”！

陶铸为中南运动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且从正面承认了“湖北日报”的改组。因湖南张平化的被动，王任重和从中南调北京人员一一被抛出，陶铸节节败退，他在中南地区已退到底线，

也面临了离开北京“干脆回中南”的命运。

25日清华大学6千多人上街示威游行，呼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广播车并广播了“刘少奇破坏文化大革命、坚持资反路线的十大罪状”；在同时广播的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声明中，将“王任重必须在1966年12月31日以前回清华交代反革命罪行”作为第三条；其前二条就是强烈要求王光美和薄一波回清华检查、交代。陶、王被吸入了文革最大的政治漩涡。也就是在这一天，经中央和中南局同意，王任重被二司、三司红卫兵从广州揪回武汉。

一个当事人原明回忆说：“中南局书记的王任重被打倒。不久，武汉的造反派专门赶到广州来要人；广州的造反派则要求就地批斗。两派发生争执。当时的广东省委考虑到王曾在武汉任职多年，深得武汉百姓爱戴。所以决定让王任重跟武汉造反派走，但由于担心广州的造反派得知后闹事，故决定用专机秘密将王任重送至武汉”。“不知为何，广州的造反派还是得知了消息。凌晨四五点钟，数十人气势汹汹杀到机场，占领了候机楼，要求交出王任重。民航领导急忙出面安抚，同时拒不承认王本人在机场。其实，王任重确不在机场。天亮后，王才坐着汽车直接到了停机坪”。当时原明“就守在舷梯旁边，造反派就在几百米外的候机楼内，气氛非常紧张。但是，王任重却神情自若，还微笑着向大家点头致意，随后，就和十几个武汉的造反派一起上了飞机”。此即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人。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回忆：“（我）保王任重。王任重本来是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江青同志早已说他是个黑枪手，点了，我以前不敢点他的名，只是他错误严重，批判了以后再讲，将来看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十二月，造反派从广州把他揪到武汉来，我还叫韩东山到飞机场（按：与省委商量降在军用机场）去接他。就是派人去接他，问好！这是什么立场？资产阶级立场嘛，看这个鬼啊！他是敌人嘛，还是保他，助他的威”。省委和军区依然按惯例热忱迎接了被群众揪回的王任重，没有想到事态会发展到不可控制的一步。

12月30日，陶铸接见武汉“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赴京人员，严厉抗议学生的无理。

文革以后，最先在编述里写陶铸接见武汉“揪王”造反派，武汉学生群众无理取闹情节的是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该书说12月初“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就进京要求接见，陶铸因为事务繁忙和对王有保留看法，没有答应立即安排；后来江青等通过红旗杂志“某些亲信”挑唆群众，“使本来是要求接见的口气逐渐变化成命令陶铸来回答问题”。接着谈到12月底，陶铸再次接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群众代表，“接见活动简直象是开批斗会。群众代表狂叫着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代表’，并声言要将陶铸本人带走”。权延赤的《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专门用了一小节文字“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来记述12月30日的这次接见和冲突。文中谈到，在造反派不怀好意的围攻下，中央警卫局的同志和陶铸秘书张汉青报告陈毅、李富春和周恩来，周恩来叫秘书周家鼎：“马上到会场去，帮助做工作。要保护好陶铸同志，不能让红卫兵带走”。并让几个副总理守候在附近，“都不要走，在一起等候陶铸，不要离开”。“尽管有这么多人做工作，陶铸还是被围攻了6个小时。几位老同志也守候了6个小时”。权文说武汉造反派在拂晓前拿着所谓陶铸的“罪证”离开，立即赶印出大批传单和小报。“陶铸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陶铸丧心病狂地向毛主席提抗议”的骇人标语和各种流言在京城迅速传开。

这是陶铸最后一次公开接见武汉造反群众，当年群众或许至今并不十分清楚陶铸当时在中央高层的境遇和苦痛，不明白他是在“垮台”前夕与武汉群众最后的坦诚对话。本来在12月上旬，群众是要求揪斗王任重，要求陶铸接见；到年底，王已经被揪到武汉，该“专揪团”部分进京人员，多少听闻陶铸在中央地位堪虞，将对话升级为要求陶铸回答问题，不过从后来严厉审查有关群众、揭批“参与迫害陶、王问题”所涉及事实看，似乎没有看到中央文革某某人

在12月曾授以计谋、透出消息或暗示。严家其凭什么说江青的亲信挑唆群众？不知是否指阎长贵在16日的接见讲话，但正直的阎那时还未上任（江的机要秘书），阎也并不是她的私人亲信，再说，查遍阎的讲话，也没有任何地方显示出企图煽动群众去围攻陶铸。

从该造反团记载并留在世间的谈话记录看，接见开始，双方用不少时间纠缠，争论要不要录音，是接见还是“回答”问题会议的形式、性质，大家的相互关系等等。显然，造反派对陶铸的认识和态度也有了变化，有对立的情绪。虽然，一些部门（如医科大学、教育部）、一些人（如毫无政治背景的中学生陆荣根），一直言辞骇人地撰文公开攻击和批判陶铸，但武汉人在1966年还没有公开怀疑、批判陶，反而希望通过他的公开支持来扳倒王任重。

从当时记录看，对于学生有关质疑，陶铸是如此回答的：

对王任重问题表态。“我觉得王任重的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他的问题不单是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而是性质比这更严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压制群众。他的很多东西是更早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到底最后这个人的性质怎么定，我赞成你们彻底揭，揭到什么就是什么，性质是根据事实，材料来定，先有材料、事实才能定性，现在初步不能定性”。

“最近中央常委工作会议，文革小组讨论了这个问题，根据现有材料，不仅是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有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言论，同志们充分揭，我们支持同志们放手揭，充分揭，中央最后会作结论……同志们今天的要求我可以反映，同志们要求打倒、罢官是有理由有根据的，最后会做出决定。文革小组副组长挂名，实际工作没让他做。关锋、戚本禹与湖北松涛等讲话，已讲王任重不做文革的实际工作，他的指示不能代替中央文革。那是十一月讲的”。“我要讲清楚，我对王任重很器重……我走后中央决定提他为第一书记我也赞成，我对他是信赖的。他干的事我都不知道，中央文革也不知道。他的错误严重也在这里”。

“如印刷40万份宋彬彬的传单，后来人大何一华来反映，我才知道，他们讲武汉文化大革命情况，我感到情况比较严重，那时我感到味道不对。为什么自己吹得那么厉害。三点指示作为九月份那时还认为还不错。讲了湖北基本上跟主席思想的，现在讲那当然很不好。王任重这样一个人还能紧跟毛主席？因为中南五省，湖北还搞得比较好一点。如武大揪出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三家村’，那时还不错，不仅我这样认为，很多人都这样认为。……文化革命中，他做了很多坏事，我不知道，要刘仰峤去武汉休养，要张体学用家史诉苦，而且张体学还退出会场，后来我才知道是他想的办法。说张体学贫下中农出身，在很多问题上，张是瞒着我们干的，那时，我不管中南局工作，他不与我联系，当然与我有点关系，我是常委书记，我认为他有北京经验指导中南工作，不是很好的吗？”

陶铸承担了自己的责任，而且在王任重与中央文革的关系上，他现在已经与文革小组其他成员口径一致，即王任重在北京做的事中央文革不承担责任。

关于湖北日报问题。“关于《湖北日报》的问题：我的态度是明朗的，支持革命同学的，你们封《湖北日报》是革命的行动。上次你们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来了，要求罢二人的官。我当时讲，是否分两条走，在雷行和刘江峰两人中先罢掉一个，把两人拆散了就不能狼狈为奸了，留一个，看一看，如果真的改正错误也还可以。还谈到现在不能马上复刊不要紧，用《人民日报》代替。……如果他们不改正错误，就彻底改组”。

对中南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以前派工作组我是同意的。在武汉停四个小时，湖北省委提出派工作组到武大我是赞成的。当时我对中南地区文化大革命估计是较好的：1.工作组派得迟、

撤得早，不象北京那么早。2.压制群众不那么多。3.工作组起了夺权作用。群众斗群众不那么厉害。……（我）没有认识到中南地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了严重后果，只感到领导不放手。这说明我那时对中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估计是错误的。九月份湖北问题发生了，我与王任重谈过，说中南地区的问题值得注意，不是原来想象的，问题大，已暴露。到九月下旬问题更清楚了，到中央工作会议，赵紫阳说没有执行方向路线错误，我认为不对，而是基本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不改正，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来，中南局不仅搞得不好，完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严重恶果，我当然有责任，虽离开了中南，派工作组我是同意的，对中南文化大革命我当然有责任，相当一段时间我的估计是错误的，未提到错误路线这一高度。直到中央工作会议才提到路线高度，但也没有完全改正。我在中南那么久，中南的问题与我有关……对中南地区的错误我是有责任的”。

概括性地说“问题的关键是湖北省委、中南局、王任重，怀疑我是否包庇王任重；我支持你们，我坚决支持你们，如中南局现在支持你们，那也就好了，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现在错误还是两条路线，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还很坏，两条路线问题，他不仅是认识问题，还是立场问题。如不继续发展下去，改正错误，还可以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整个湖北省委还是路线问题。应该彻底改正，支持你们，一起革命。中南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多少揭多少。要改正错误，支持你们，回到正确路线上来”。

陶铸承认错误、耐心解释疏导和解答问题，承担了责任；到接见的最后阶段，双方气氛实际上已经缓和了许多，陶铸自己就说双方情绪“有些接近”，得以心平气和谈出自己看法：

同学：你讲你是中央常委、文革小组顾问，是来接见我们，但今天一开始提出抗议，想不通，不知犯了什么原则错误？……

陶铸：我不是对红卫兵提抗议，是讲会议形式，你们那种方法是不妥当的。你们好好想一想，我来时你们到底把我当什么来对待，我商量的问题都不能同意，录音，代表，名字也不提，对我不信任。你们对我态度不对，怎么能把我当成反革命。

同学：我们没有对立情绪，你刚才的态度是出意料之外。

陶铸：同学们对我的态度也是意料之外的，我讲了抗议就算了。（同学插话：一定要收回，要批判）那是激动，以前同学们对我不信任。你们如对我的话是信任的，抗议可以撤销。怀疑是可以怀疑的，今天会议形式不恰当。（同学插话：是否是原则性的问题，值得向我们提抗议。）今天谈得还不错，情绪我们有些接近，怀疑是可以的，但问题没有商量余地，我是不高兴的，太不信任了。现在接近了。如果你们认为我还可以信任，态度是诚恳的，抗议可以撤销。（同学插话：我们态度好不好？）你们的态度是不好的。……

同学：抗议提得不恰当，不仅要收回，而且要批判。你一讲，我们就成了不革命的了。

陶铸：我不同意这样讲，我是对会议方式提抗议。

同学：应在这问题上触及一下灵魂。一是我们一来未找陶铸，一是未达成协议，一是你进来未鼓掌，好象打破常规，失去尊严，这就是灵魂深处的东西。对老前辈应尊重，有缺点，错误应提出。

陶铸：批评完全可以，前后讲一点，不是尊严的问题，同学们来时形式不是开诚接见，谈判，

解决问题，是对我很不信任的形式，又要我解答问题，采取这样一个极端不信任的态度，发言派代表，名单不给我。整个会议不是给我机会商量解决问题，我是不满意的。后来说得很好，是我了解，能解答的提出来，开始有点脾气，现在同学们批评，撤销抗议，承认这是错了。（众鼓掌）还要看我是不是支持你们，如果真的支持同学们，我还可以信任，我还要革命的。好，再见！

从记录的最后气氛看，这次陶铸与群众的接触，并没有达到当时造反派渲染、社会流传的那样糟糕程度，也没有文革后一些研究记载那样，说双方是出于自觉的对抗。陶铸在自己最危难时刻，尽管极为气愤、不平，对群众还是冷静、坦率、诚恳、原则的，要造反的学生群众，也是单纯、青春气盛的。1967年元月4日，陈伯达与江青接见武汉“专揪团”公开点名打倒陶铸，当日毛泽东就问周恩来“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是怎么回事”，周婉转回答，“不是镇压，是陶的态度有些不好”。所谈就是指的12月最后的这次接见。周恩来并让秘书告诉蒯大富向“专揪团”传达毛泽东的意见：不要把王揪到北京来，让王就在武汉检查。

（未完待续）

□ 《东湖风云录》 徐海亮编著 银河出版社，2005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